

人生需要

- 当代苏联中篇小说选辑
- 上海译文出版社

爱



人生需要爱

当代苏联中篇小说选辑

人生需要爱 / И·格列科娃著 于国畔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И. ГРЕКОВА

ПЕРЕЛОМ

本书根据苏联《ОКТЯБРЬ》1987年第8期译出

当代苏联中篇小说选辑

人 生 需 要 爱

[苏联]И. 格列科娃 著

于国畔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 134,000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000 册

ISBN7-5327-1022-X/I·548

定价：3.15 元



为什么要写这些札记，我自己也不知道。它们有点像以往生活的摘要，其中包括了这段生活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从一种状况到另一种状况的落差和转折。照常人的一般看法，我还不算老，但是我似乎觉得自己已活了很久很久，我不止活了一个一生，而是几个一生。

我又处在一个转折点上。一个阶段结束，另一个阶段即将开始。这个新阶段现在还是隐隐约约的，正在勉力地蹒跚着。我要跟自己谈谈，争论一番，甚至吵上一架。反正我要了解自己。

“又是您那珍贵的自我！”他会这么说的。他也许说得对。但是，这个“自我”在我身上占据的时间太久了，因此无法一下子摆脱它。再说，是否需要这么做呢？“自我”的某些成分好像也是值得保存的。免得彻底地陷入无个性状态。不要退化成一条直线。波动就是生命。波动一停止，生命也就结束了。

各种各样的变化、各种各样的生活情景老是在脑海里互相重叠地浮现着。好比阴天的云，总是一层叠一层地浮动。哪一块云离得较近，哪一块云离得较远，这是绝对搞不清的。就让思想也像那些云一样杂乱无章吧。我用医生开处方、病历和转诊单的那种特有的潦草的笔迹来写这些札记。无论谁在我死后研究我的手稿都会看不下去的。但是，我相信，死神还不会很快就

降临：我还没有死的资格。

在这些仅我自己一个人用的札记中，逻辑性也罢，连贯性也罢，都不是必不可少的。可以自相矛盾，就像我们在生活中每迈一步都会自相矛盾那样。我不想努力去做一个比自己更聪明的人。还没有一个人做到过这一点。

什么是“智慧”？它多半就是一种透过现象去看本质的能力。不是理解现象的外在联系和原因，而是理解它们的内在联系和原因的能力。我历来都没有这种能力。我经常扪心自问：为什么在生活中发生的情况恰恰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呢？我苦苦思索过，但找不到答案。我不聪明。

还有一种比智慧更高的东西——那就是睿智。老人和孩子往往是睿智的。我窗外的人行道上那只正在啄食碎屑的鸽子是睿智的。我家的那条大街上互相平行地斜长着的那些树木也是睿智的。也许，到垂暮之年，睿智会降临我身。但是，这也未必。现在的老人们罕有睿智的。大多数老人至死都在碌碌无为地瞎忙乎。

了解自己——这种事有谁办成过呢？我想在自我交谈中了解自己（哪怕是部分地了解）的尝试是不是枉然呢？我不知道。我也许已经成不了一个真正的人。但是，在我的残生中（不管它尚留多少日子），我可以（也希望能）改变自己。我要向自己和自己的记忆许下诺言：我要尽一切努力去改变自己。

现在，过去，过去的过去，过去的过去的过去。最近的将来。遥远的未来。我们的语言区别不出这种细微的差别。但是有一些语言能表达出许许多多时间差别。它们反正也不能使我摆脱混乱的时间概念。我的所有关于过去、过去的过去等等的想法，都只是为了将来。只要活着，就有将来。

也不仅仅是活着时才有将来。人死了，但是他依然存在。我把这句话当作咒语来反复地说。

我在写，并且老是停笔自问：是否表达得太漂亮？然而，要知道，有时缺少这一点也是行不通的。美和漂亮通常是有区别的。可我认为，不是总能正确区别的。“生活像河流一样把我冲走了。”——这句话是美，还是漂亮呢？两者都不是。不过说得很准确。

人们在类似环境中有着类似的感受，并用类似的语言把它们表达出来。我自然也不例外。

思绪就像大风所驱赶的那些云朵似的在奔腾。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让它们停下来。我经常对自己说：等等，别着急，别乱写。先好好思考。

也许，写这些札记是一种使思维减速的方法。我们写得毕竟要比想得慢。

—

究竟应该从哪儿开始写呢？脑海中一个劲地浮现出我初次见到柳霞·希洛娃的那个早上。那是一个幸福的日子。

在我所生活的那个阶层中，一般说来，我算不上幸福，然而却是满足的。主要的一点——我是自由的。鲍里斯病愈出院了，像浅浅的刀口上的痂皮似的消失了。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不久前，医院的主任医生（我一般都叫他主任）在一次会议上专门表扬内二科主任基拉·彼得罗芙娜·列乌托娃（这是我）工作出色。

我珍爱自己的专业——内科学，一个充满着谜的王国。内

科并不像外科：切开来就看得见。人不是透明的，虽说有各种 X 光透视设备和超声波、体层 X 光照相等最新技术设备。来了一个女病人，她诉说：肚子疼。问她怎么疼，哪个部位疼，她指着说：这里疼，是从这儿突然发痛的，而这里仿佛堵得慌。你就试着去猜她得了什么病吧。也许是溃疡？也许是阑尾炎？也可能是子宫外孕吧？或许是一种与肚子没有直接关系的意外情况，例如，心肌梗塞吧。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

必须在所有这些可能性中理出个头绪来。排除不相宜的可能性，列出最可能的情况。最终选出一种说法，作出诊断，确定治疗方案。把握住一个人的命运。

在医院里，我被认为是一个诊断较有把握的医师，这个看法也许是公正的。直觉，经验，要不然就是运气。经验是主要的。譬如说，病人的眼神、肤色、手触摸被子的特有动作，这些都能向一个有经验的医生说明许多情况。当我给病人看病时，眼前马上就会无形地出现许许多多我以前遇到过的其他病人。

最近，许多人在议论机器诊断法。我说不准。这种诊断法或许也有某种好处，特别是对一个刚开始工作的、缺少经验的医生来说。机器能给他提示一些情况。但是这毕竟只是提示、暗示而已。最后的诊断、治疗方案，这都得由活人——医生来担负。只有他才能承担失败的责任。

我想起一个大笑话：在一个科研会上讨论机器和人的区别（这个问题在当时是很时髦的）。有人开玩笑说：“区别就在于，可以让人坐下来，而不可能让机器坐下来。”虽说是玩笑，但这里面也有一点真理。人要对自己的决定负责，而机器是不会负责的。

还有：人与人、医生与病人的交流和直接接触，在医疗的成

败中也起着巨大的作用。善于博得病人的好感，赢得病人的信任，成功也就有了大半的保证。

在那个寻常的幸福日子里，在上班的路上，我想到(或者是回忆着所想到的)所有这一切。

那一天为什么是幸福的日子？一早我就知道，马克西莫娃——科里的重病号、心肌梗塞病人、三个孩子的母亲，仿佛(呸、呸！)即将脱离危险。我曾一连三个晚上在她身旁守护。人工呼吸、心脏按摩……终于得救了！我疲劳得几乎站不住了，该回家、睡觉……我对值班护士说：“柳博契卡，我要走了。如果有情况，马上打电话给我。”“好的，基拉·彼得罗芙娜。”

她，我可爱的助手多么漂亮呀！娇嫩绯红的脸颊，一双浅蓝色的眼睛，像泉水那样纯洁。脖子上垂着一绺绺淡黄色的鬈发。上过浆的帽子不像戴在她头上，倒像偶然扣在她头上似的。我就喜欢医务人员这样讲究衣着，注重外表。她是一个勤奋、认真、心地善良的人。如果她将来不被宠坏的话，定会有出息的。有着这种外表的姑娘容易被宠坏。

夜里，电话铃没响。我美美地睡了一觉，一躺下就睡得死死的。我做了一个梦——就是那种只有在几天几夜不合眼之后才会做的、像棉絮般绵软的酣梦。正在做梦的时候，闹钟突然令人心惊地响了：出事了。我立刻奔到电话机旁，往科里打电话：

“柳博契卡，马克西莫娃怎么啦？”传来一阵爽朗快乐的声音：“没什么，睡了。一夜已平安地过去了。看来，情况进展顺利。”

“顺利、顺利、顺利！”靴子在雪地上咯吱咯吱地叫着。这是一双新靴子，我第一次穿。轻得像羽毛一样。是进口的高跟靴，还配有镀金的小链子。这种靴子不容易搞到。这还是过去的一

个女病人帮忙弄来的，谢谢她。一般来说，我不是一个赶时髦的女人，但是这双靴子使我感到很高兴。尽管我也受到医生这一职业的束缚，可我毕竟是个女人。

一个晴朗的冬天的清晨。砖砌成的红褐色的古老塔楼上披着一层粉红色的晨曦。看上去，霞光正托着这些塔楼往上升。

我多么热爱自己的城市、自己的故“省”啊！它算不上是大城市，算不上是美丽的城市，也不受旅游者的青睐，但它却爱惜地保存着自己的古风，自己那副虽被时间侵蚀但仍很漂亮的面貌。战争的痕迹——墙上和塔楼上的那些用别的颜色的砖头修补好的窟窿也无损于它的面貌。它们就像老战士脸上的伤痕，很显眼，但也很光荣。它多么自由自在地散布在自己那片山丘上，座落在一条大河和一条中等河流的汇合处附近……

我停下来观赏风景。从这儿的高处俯瞰，能清楚地看到这两条河。春天尚未来临，河面仍然覆盖着冰。冰面并不平整，七高八低的，还缀有黑乎乎的冰窟窿，冒出团团水汽。在对面的远处，像笔直的标杆似的林立着工厂的烟囱，那烟囱细得像火柴梗。它们冒着黄色的、灰色的、粉红色的烟。所有这一切美得令人心动……

那天早上，我感到特别幸福。为马克西莫娃、为整个世界、为自己而感到幸福。我爱整个世界，也爱我自己（干吗要委屈自己呢？）。

顺便谈谈对自己的爱吧。请别把它同自私自利混为一谈。自私自利是不好的，这用不着争辩。但是，当一个人感到幸福，热爱整个世界，热爱其他人——其中包括自己时，他的心态又该怎么称呼呢？创作状态也包括对自己的爱（“普希金真棒，狗崽子真棒！”）。这是我从生活中所取得的经验教训之一：一个幸福

的、知足的、与世界和谐地融为一体的人会把幸福传给别人。像痛苦一样，幸福也有感染力。痛苦最好还是要隐藏起来，而幸福则要说出来。

这时发生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不知为什么我至今对它记忆犹新。那是两个小男孩。

我站在高处，欣赏风景。远处山脚下有一片河面化了冰，冒着一团团的水汽。旁边临水的边缘处，有两个像小钩子似的黑色身影——两个小男孩。他们都拿着钓鱼竿。他们站着，看来是在争吵：这个踢了那个一脚，而那个还了这个一脚。眼看就要掉进水里。

我喊叫道：“喂，你们在那儿干吗？快离开水边！”毫无反应。没听到？

我心里开始焦急不安。仿佛这是我的亲生儿子——米佳和瓦柳恩在冰窟窿边上打架，眼看两人都要掉进水里了！

母亲的担忧是持久存在的。儿子们早就长大成人，也不会再哭了。但是，至今为止，每当孩子大声嚎哭着爬上楼梯，当响亮的哭声在四周回荡的时候，我的心都会往下一沉。我会打开门，替大哭大叫的孩子擦鼻涕眼泪，问怎么回事（回答是含糊不清的，是埋在鼻涕眼泪之中的，大概是说“他干吗打我？”），然后好歹哄得他不哭……

对这两个钓鱼的孩子究竟该怎么办呢？下去把他们拖离水边吗？我担忧地看看自己的高跟鞋。尼娜·康斯坦丁诺芙娜曾劝我别赶时髦，也许她是对的……但是，现在该怎么办呢？应该下去。

我跨过积雪的路边，一溜一滑地往下走。山坡上结了冰，而且很陡峭。我站不住了，坐下来，往下滑，就像旅游者说的那样，

“用第五个点”。

往下滑总是越来越快。总算勉强地及时刹住了，否则自己也会滑下水的。我整个身子都躺在雪地上。没说的，那副模样够好看的。孩子们因事出意外而停止了打架。从上面竟然滑下来一个阿姨！那个大一点的孩子长着一张呆板的三角脸、眼睛凸出。另一个孩子身材稍矮一点，是个胖乎乎的金发少年，棉帽底下露出了一络额发。他俩都快冻僵了，鼻子通红通红的，都戴着湿手套。原来，他们是为捕到的唯一的一条手指那么大的鱼而打架。

“您来这儿干吗？”那个大一点的孩子问。

“没什么特别事。”我想站起来。

“阿姨，需要帮忙吗？”小的问。这孩子真可爱！他伸出一只手。我好不容易才站起来。

那个大一点的孩子说：

“上了年纪的人了，可还像小孩似的，也来这一套。”

也许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人家说我是“上了年纪的人”……然而，对这种孩子来说，所有的大人都是上了年纪的人。

“我为你们担心。竟然在水边打架！离遭殃还远吗？”

“远——着——哩，”年龄大一点的那个孩子拖长声音说。

小的却说：

“我们已经打完架了。现在要回家了。让我帮助您，路太陡了。”

我们三人费力地登上了陡坡。

我滑下去是想帮助他们，结果是他们帮助了我。

两张小男孩的脸——一张略有一点阴沉，另一张显得善良。一条引起争端的小鱼，它已被遗忘在冰上（在近处看，冰层略呈

蓝色)。

为什么我还会如此清晰地记得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呢？也许这就是无意中朝过去瞥一眼的未来吧？

二

我边走边想：为什么孩子们总要争吵呢？就说我的米佳和瓦柳恩吧，无论如何也不能和睦相处。孩子们多么不相同啊！

米佳是医学院毕业班的学生，未来的医生。他人长得难看，身材极瘦(看上去肩膀只有一拃宽)。近视眼，背有点驼，像年轻时的鲍里斯，但是没有他那种神经质，也没有悲观的情绪。一个锡制的坚强小兵。学习成绩全是五分，挺高的奖学金一戈比不剩地交给我(我替他买季票)。将来会是家庭栋梁。然而，等他结婚后，会不会成为栋梁呢？他暂时还没有女朋友。

小儿子瓦柳恩恰恰相反。是个身材魁梧的漂亮小伙子，长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副洁白的牙齿。十年级学生，快要毕业了。学习成绩不大好，大都是三分。有时也会令人惊奇地得个四分。姑娘们不时地打电话给他(暂时还只是打电话)。他不考虑将来。总带着一种轻率的、多变的、令人羡慕的无忧无虑。

经常有人问我：最喜欢哪个儿子？我回答：一样喜欢。一样喜欢的情况并不常见。爱得是一样强烈，但方式不一样。对米佳爱得比较严肃，对瓦柳恩则爱得比较亲切。从产科医院的女护理把他抱来喂奶起，他的脸就是红扑扑的，他皱起了鼻子，打了个喷嚏。真像一个大人！这张婴儿脸上的两道完全定型的清晰的黑眉毛也使我惊讶。“将来是个美男子！”女护理说。不错，他已长成个美男子了。

人们说，他长得跟母亲一模一样。不，比我漂亮得多。我自己也不明白，我怎么会生出这么漂亮的孩子。“我有幸看到的一个最漂亮的男人，”一个熟人谈到他时说（男人嘛，她已经看够啦！）。连我自己望着自己的小儿子时也经常无法移开自己的视线。正是在这种黑眼睛的美中常常会有一种令人倾倒的诱人的东西。对这种美，看着看着，就会像飘浮在黑色的……

黑眼睛——是像外祖父，像我的父亲。他也是黑眼睛。我和母亲的眼睛都是褐色的。

三

当时我长得还不难看。在大街上，人们都叫我：“姑娘！”不过，现在都把十五至十七岁的少女叫作姑娘。我呢，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我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发胖，因为我遵守作息制度。每天早上，不仅仅做操，还做健身操。上下班总是步行。我不怜惜自己，不娇宠自己。

以前，去医院的路上我经常考虑过去的过去，尽管它已经过去了，但还没忘却，也没有完全宽恕。

唉，鲍里斯，鲍里斯，你伤害了我的神经！这并不是说我很爱他（共同的生活早就出现了裂痕），但是，我为他，并且也为自己感到羞愧。至今仍羞于回忆。当他回来负荆请罪时，我总是原谅他，重新收留他。我替自己辩护：“孩子需要父亲！”其实，孩子们已不那么需要他了。从一开始，一家之主就不是他，而是我。

唉，鲍里斯，鲍里斯（我在过去思考着过去的过去），在这件事的全过程中，你都是个懦夫。懦夫加傻瓜。奔波于两个女人、两幢房子之间。有时，爬回来说：“我只爱你，求求你，原谅我，

收下我吧！”我会原谅他和收留他的，虽不是马上就这样做。他打开箱子，把睡衣放在双人床上。把润肤液、剃须刷放到浴室的搁板上。晚上却又打来了电话：“基留莎^①，原谅我，我是个坏蛋，是个畜生，我现在在米洛契卡家里，简直绝望了。我这儿什么也没有——既没有睡衣，也没有剃须刀……让米秋沙^②明天早上把箱子顺便送到这儿来，请他别忘了带剃须刷和润肤液，就是那个放在浴室里的天蓝色的小瓶子，知道吗？你别生我的气，我自己也倒霉透顶了。”

我咬紧牙关，把剃须刀、睡衣、润肤液、剃须刷扔进箱子里……派米佳送去：“这是最后一次！”米佳很不满，发着牢骚。

过了两三天，鲍里斯又回家了，他后悔，哭泣，跪下来吻我的睡袍下摆，发誓说，没有我，他活不下去，还威胁说要去自杀……“我只爱你一个，那是一时错乱。相信我吧！”

我真是一个白痴——相信了，原谅了，放他进来了……

要不是米佳的话，这种情况大概还会一直继续下去。当鲍里斯提着箱子又一次回来时，他死守在大门口。他说：“我不放你进去。”结果没有让鲍里斯进屋。然后，他对我说：“你是医生，可你却不懂，必须一次就把狗的尾巴砍掉，而不是分几次。”他是对的。其实，早就该砍掉这条尾巴了。

离婚时，我们的理由是那句公式化的话——“性格不合”。这话毕竟也是对的。我那时是个急性子，精力充沛，办事干练。他正好相反，是个脑筋迟钝、爱发牢骚的人。像一个令人生厌的倒霉鬼：您瞧，所有的人都顺心，就是他一个人不如意。一个无才能的新闻记者，磨磨蹭蹭地一年发表一篇小文章。只会一个接

① 基拉的爱称。——译者

② 米佳的爱称。——译者

一个地堆砌华丽的词藻：“瞧，冬天的暴风雪已经像旋风似的在我们的城市上空盘旋。新年即将来临。美丽的枞树很快将亮起七色的灯彩……”老是这一套。他大声地念给我听，期待着称赞。我也称赞过，在我爱他的时候。可是我爱过他吗？现在我感到怀疑。起初是有过一点类似爱情的东西——爱情的惴惴。我曾让自己相信我在爱，并且一时也相信了。大家都在爱，我也爱，大家都要出嫁，我也出嫁……

现在我明白：我不善于爱。真正爱的只有一样东西——我自己的工作。工作就是我的神灵。我的偶像。我的麻醉剂……而鲍里斯呢？他从一开始就处于第二位，处于次要的位置。

年轻时，他长得并不难看——灰眼睛的高个子；但是快到中年时，变得干瘪了，头发有点脱落了，患上了十二指肠溃疡。他重视自己的溃疡病，像对待某种成果似的，对它关怀备至。妻子是医生，难道不能保证丈夫有营养的饮食和合理的作息制度吗？

可是，当医生的妻子天不亮就要去上班，整天都在值班。如果不值班，就会接连几夜留在重病号的床旁。鲍里斯生气了，把一切都献给了病号，却什么也不给他。“难道我不是病号？”现在我明白，他的话也有点道理。但是，一切都好转了。我并不感到遗憾。

鲍里斯经常去找的，并最终到她身边去的那个“第三者”米洛契卡在一家杂志编辑部当打字员；那本杂志上偶尔也发表鲍里斯的作品。不是文章，而是小短文（他暗自说：“我是写小文章的大师”）。他用的是一个在我看来是很傻气的笔名——“鲍里斯·列夫诺斯特内^①”（他觉得“列乌托夫”这个姓太俗气）。这些小短文米洛契卡每次都要重打好几遍。他把它们送到编辑那儿，

① 俄文该词意为勤勉努力。——译者

每修改一次，它们就会变得更无个性。米洛契卡可怜作者，看来，也就是因可怜而爱上了他。有一次我看到过她一眼，没什么特别动人的地方。不能说她长得难看，可长得也并不漂亮，虽然很年轻，比他小二十岁。身材小巧、瘦削，动作轻盈得令人讨厌（真想像拍蛾子似的一下子把她拍住）。她靠什么诱惑住他呢？大概是凭赞赏，男人都喜欢别人恭维。他在家里得不到赞赏，真的，的确如此。

他走了，住在自己情人的公共住宅里。记得，当时我甚至不无得意地想象过他提着耷拉在裤子边上的背带排队上公用厕所的情景……真是小心眼！如今（现在）我想起他时，一点也不感到痛苦。甚至还带点怜悯。他不该娶我，而我也不该嫁给他。

实际上，他走的时候是相当大方的：没有提起房子的事，他本来是可以提出来的……房子留给了我和儿子；孩子们住在拐角上那间有凉台的房间里，我则住在过去我们俩住的那间房里。

他走了，但是久久不让我安静。单是米洛契卡夜里打来的电话就够令人头痛的了！她不知为什么总喜欢在夜里与鲍里斯一起躺在床上的时候打电话来查问我的态度。只要一闭上眼，电话铃就响了。“喂。”传来的是一种尖细得像蚊子一样的声音：“基罗契卡^①·彼得罗芙娜，我知道您心里很烦恼……（“我没什么烦恼”，我想发火，可是她不听我的。）鲍里斯也非常烦恼，真的是在哭，泪珠很大，像……像小酒杯那么大。要不要我现在就把听筒给他？”“不要。”鲍里斯插了进来，他抽抽嗒嗒地哭着说：“基柳莎，请你仔细地听完！”我扔下了话筒。过了一会儿，铃声又响了：“基拉·彼得罗芙娜，您为什么不肯听鲍里亚^②把话说完呢？

① 基拉的爱称。——译者

② 鲍里斯的爱称。——译者